

DOI: 10.3969/J. ISSN. 1674-1471. 2015. 01. 012

新中国外交: 安全与发展的互动

郎 帅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1949 年至今, 新中国外交分别经历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核心的五个时期。60 多年来, 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成为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两条主线, 我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的互动。在二者的作用下, 新中国外交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对之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 对于我国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开启我国外交的新征程、开创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 安全; 发展; 互动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471(2015)01-0059-05

China's Diplomac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LANG Shua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rom 1949 to 2013, China's diplomacy experienced five periods with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Hu Jintao and now with Xi Jinping as the core of the central leader collective. They are the two main lines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hina's diplomacy.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ies largely depen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lines. China's diplomacy is embodied in different forms at different times. It is important to summarize these forms systematically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starting a new journey and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security; development; interaction

国家外交就是一国试图通过运用实力资源去劝说别国让步以增进本国利益的过程^[1]。其主要目标是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服务, 为国家的安全创造条件, 为国家的发展赢得空间和时间。1949 年至今, 新中国外交分别经历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核心的五个时期。对之进行系统梳理后不难发现, 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是贯穿于其始终的两条主线。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的互动。在二者的作用下, 新中国外交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之进行归纳和总结, 以期为中国外交新征程的开启、新局面的开创提供借鉴。

一、安全为主, 发展为辅: 为和平奠基

毛泽东时期, 在安全与发展二者的互动过程中, 安全居于首要地位, 发展处于从属地位。某种程度上安全压倒了发展, 安全制约了发展。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

(一) 1949-1958 年

这一阶段, 维护国家安全、巩固新生政权占据突出位置。从中国国内层面来看, 安全风险尚未消除, “敌我状态”持续存在, “阶级斗争”仍需继续。新中国成立之初, 解放战争还未完成, 西藏、新疆、海南、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尚未解放, 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全国各地负隅顽抗, 大量土匪、反革命分子对新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国内经济凋敝, 百废待兴, 百业待举。

收稿日期: 2014-11-17

作者简介: 郎 帅(1985-)男, 河北沧州人, 吉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2013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大国战略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巩固自己、强大自己。这一时期的国内斗争集中表现为银元之战、米棉之战、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事件。

从国际层面来看,新中国的成立与美苏两国共同构筑的两极格局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与新中国的决策层没有什么关系,但不可否认,体系对置身于其中的任何成员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制约力量^[2]。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一成立就卷入了冷战的漩涡,被迫做出抉择。美国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同世界其它地区的共产主义毫无二致,它的目标就是获取绝对的权力并建立一个集权主义国家^[3]。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它立即表示拒绝承认,政治上遏制孤立,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打压,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

对国内外严峻形势通盘考虑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新中国决定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于是,中国在明确对苏关系的同时,也明确了对美关系,中国成为苏联抗衡美国战略力量的一部分,也成为美国在亚洲抵制共产主义战略的打击对象,美国则明确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敌^{[4]175}。在1949至1958年中苏友好的这一阶段,中美相互敌视,并最终于1950至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借机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或安保协定,构筑了遏制中国的包围圈。

(二) 1959—1971年

这一阶段,中国的外部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保障国家安全依然是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中苏关系恶化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苏在关于实现和平共处、革命行动路线上的矛盾越来越大,在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问题上,中国强调的是武装斗争,而苏联则认为要依靠和平竞争”^[5]。在中方看来,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这必须要予以抵制;苏方则认为,要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要对独立自主的中国施加控制。双方的隔阂变得难以弥合,先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后是经济关系的破裂,最终走向了边界上的刀兵相见。

除了苏联外,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一大安全忧患。在军事领域,美苏两家都把中国看成是今后对世界和平的更大威胁;中苏边境上苏联重兵压境,美国插

手越南,这都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似乎不理性、日益难以捉摸的核国家的反应^{[6]332-333}。可以说,此时中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南北受敌,东西交困,环境异常恶劣,前所未有的。于是,在外交上,作为国内“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延伸,毛泽东积极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既支持反美国家的革命运动,又支持反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希望从外部获得帮助以缓解不安局面。

(三) 1972—1977年

转机出现于危险之中。在中国国内,“文革”继续进行,国家动荡,社会不安,经济停滞,毛泽东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在国家外部,苏联处于战略扩张期,陈兵百万于中苏边界,集结精锐部队进驻蒙古,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并且准备出兵阿富汗,从北、南、西三个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包围之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陆上的安全形势并未缓解。突破口出现在美国方面,在与苏联的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在对越战争中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国内面临严重分裂。这促使它在全球寻求帮手,以平衡苏联的力量,缓解自身压力。而此时中美尚在彼此为敌,“双方都感到同时与世界上两个大国对峙负担太重,每一方都试图通过亲近各自认为危险性相对较小的对手来减轻负担”^{[7]493-494}。因此,基于战略方面的考量,中美开启了缓和进程。

中国通过中美双边关系的改善赢得了外交上的活动空间,中国的安全形势有了很大改观。中日建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与许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得中国从多方面冲破了国家安全上危险孤立的状态。中国开始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the strategic triangle)中获益,在此之前它与美苏任何一国都不友好,而现在它至少拥有一个朋友,它甚至可以借助一方提供的保护去反对另一方。^[8]中国的安全上获得了更多的保障,也获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

总之,在1978年以前,鉴于国内外的复杂形势,新中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安全化的思维,采取了安全化的措施,一切以国家安全为准绳。尽管在某些方面,它也致力于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努力争取外援,促进生产,而且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确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毋庸讳言,国家的大部分精力被外部安全考虑和内部斗争耗费掉了,经济发展目标在外交中并未占据最为显赫的位置,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二、由安全主导向发展注目: 为发展定调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处于“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则迈进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大门,中国外交的一大使命就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对外交往中,经济发展被重视起来,提升到了与国家安全同样的高度。

1978-1992 年

这个时段中国的内外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显著改善。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的主题的正确论断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9]。在国际社会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10]。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形势明显改善。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发展的思路被确定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被视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1]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在国内外大势的作用下,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战略;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积极地实行对外开放。开放的目的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自己。对外开放坚持点、线、面相结合,逐步深入的方针。从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到向内陆渐进式开放,基本上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多渠道、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2]。对外开放密切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中国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金融、人才、科技、文化诸领域开展了全面地交流与合作。对外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一步一个台阶,不断取得新进展。

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下,始终存在着一股反潮流,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发展

求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首先是冷战尚未结束,到 1991 年苏联解体,世界一直处于美苏争霸的态势之下;其次是直至 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苏边界这个“世界上军事防卫最强的边界之一”才转变成为一个“和平边界”,之前中苏两国还处于敌对状态;第三是 1979 年为迎击越南的挑衅,中国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第四是“六四事件”和苏东剧变对我国的内外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干涉中国内政、制裁中国,中美关系又一次跌入谷底。中国外交需要清除这些障碍,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总而言之,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改变自己,融入世界并走上影响、塑造世界的大国崛起之路,经济利益开始与政治、安全利益并驾齐驱,进而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13]。尽管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安全形势已与以往大不相同,发展的基调基本奠定,经济建设成为了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中国外交就是为这个中心服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一个过渡期,承前启后,中国平稳地实现了由安全主导向发展注目的过渡。

三、重塑安全,共谋发展: 实现新跨越

(一) 1993-2003 年

江泽民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愈加有利。从国际层面来看,前一时期的四个安全问题基本消除。美苏冷战结束,中苏(俄)关系正常化,中国周边稳定,中美关系回暖,一切迹象表明,中国拥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不再需要在重重的冲突中求得安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发现眼前没有安全威胁了^{[6]333}。从国内层面来看,江泽民一再强调,和平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点不会改变;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头等大事^[14]。因此,在这一时期,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和有利条件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在国内经济体制建设上,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发展思路。江泽民表现出对邓小平的领导路线的尊崇,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7]586}。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在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外汇体制、银行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领域进行了改革,催生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式,释放了经济的活力。与国内对应,在外交上,一方面,中国把握住了经济全

全球化的脉搏。江泽民承认中国参与到经济、科研和交流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必要性;认为参与地区经济合作以及世界范围的多边贸易合作组织是其内部改革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7]586}。2001年,我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提出新安全观并付诸实施;推动与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积极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努力承担大国责任,塑造大国形象^{[4]195-197}。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安全的观念和实践中为世界作贡献。

(二) 2003-2013 年

胡锦涛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发展依然是党和国家的第一要务。中国的经济改革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是试点、探索阶段;1992-2001年是整体推进阶段;2002年至今是全面完善阶段^{[15]39}。邓小平处在了第一阶段,为后世奠定了发展的基调;江泽民处在了第二阶段,推进了中国的发展事业;胡锦涛则处在了第三阶段,把发展事业引向了更为科学的轨道,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这一时期,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2008年中国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国家的总体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显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一是我国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寻求一条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停滞;要对话,不要对抗;要理解,不要隔阂^[16]。二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成为金砖国家组织、G20等组织的关键成员,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三是软实力外交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不确定中国的发展意图,美日等国强化了安全上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威胁”。面对诸多疑虑,中国积极向世界传达它的真实意图和目标,努力塑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家形象^[17]。中国力争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建设者”,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世界的和谐与发展。

总而言之,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外交所有活动的开展都是与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百年大计相关的,中国所有成就的取得都是与经济发展密不可

分的。经济发展为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安全形势的改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外交日益具备博大的胸襟和气度,我国越来越多的把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与地区以及世界联系起来,中国正在实现新的跨越。

四、结 论

纵观新中国65年外交,有这样几个论点具有现实适切性:1. 国家外交是国家内政的延伸;2. 安全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所追求的首要目标;3. 尽管在不同时期,二者互动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从未脱离中国外交的视域;4. 安全与发展目标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二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其一。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处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意识形态主导的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安全高于一切,发展甚至也要为安全让路;邓小平站在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大门口,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基调;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中国的安全环境更为优越,发展的思路得以积极贯彻,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基于发展共识,历代领导集体的战略构想是:通过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进而夯实国内,站稳地区,走向世界。

2013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他们面对的内外环境和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实力的增长引发了邻国的不安,使它们心生恐惧,一种可怕的“安全困境”因此而生,更糟糕的是,这招致了美国的战略回应,其安全注意力已转向亚洲^[18]。美国正在围绕中国打造一种“雁阵模式”,中国的地区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环境、民生、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不断凸显,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红利,使其惠及全民,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亟需应对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需要承担更多更艰巨的任务,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而今,新中国外交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新一代领导集体正在踏上新的征程,开启新的篇章。在继承新中国外交六十多年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19]。中国外交的目标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障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是,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旧, 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 国际格局加速调整, 国际秩序斗争长期复杂, 周边环境存在不确定因素; 中国外交需满足的要求是, 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坚持合作共赢, 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布局是, 抓好周边外交,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运筹好大国关系, 构建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推进多边外交^[20]。

2012 年 2 月, 习近平副主席在访美期间, 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其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2013 年 9 月,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 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 2013 年 10 月 3 日, 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要“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倡导与东盟国家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 年 5 月, 亚信峰会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主席建议将亚信建设成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 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框架; 2014 年 11 月,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主席倡议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 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 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体现了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思想的新发展, 表明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国家安全、谋求国家发展的决心和魄力。在今后的中国外交中, 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发展两个目标将继续相互联系、相互激荡, 合力共振, 催生出更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克. 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 9 版)[M].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57-358.

- [2] 马嫫, 赵干城. 中国周边政策的指导原则与战略变化[J]. 国际展望, 2009(2): 26-35.
- [3] Michael F. M. Lindsay. A U. S. View of Chinese Communism[J]. Pacific Affairs, 1949(1): 71-75.
- [4] 门洪华. 中国国际战略导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5] Tareq Y. Ismae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rica[J].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71(4): 507-529.
- [6][美]罗伯特·A·帕斯特. 世纪之旅——世界七大百年外交风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7][德]卡尔·金德曼. 中国与东亚崛起: 1840-2000[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8]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J]. World Politics, 1981(4): 485-515.
- [9] 邓小平选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05.
- [10] 彭沛. 邓小平的周边外交战略及其实践意义[J]. 理论月刊, 2008(11): 30-32.
- [1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755.htm.
- [12] 张新华. 关于建国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J]. 历史教学, 2004(4): 22-27.
- [13] 门洪华, 钟飞腾.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J]. 外交评论, 2009(5): 57-71.
- [14] 饶银华. 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16-19.
- [15] 杨光斌, 李月军, 等. 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6] 《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全文)[EB/OL]. [2011-09-0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_5.htm.
- [17] James F.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J]. Asian Survey, 2009(4): 647-669.
- [18] Pei Minxin. The Loneliest Superpower[EB/OL]. [2012-03-2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3/20/the_loneliest_superpower.
- [19] 王毅. 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J]. 决策与信息, 2014(1): 17-20.
- [20]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14-11-30(1).